

澳門留美幼童及其家族研究

賓睦新*

摘要 中國近代首次官派留學的120名留美幼童中，有兩人來自澳門。史錦鏞是第一批留美幼童，1872年赴美，入讀孟松學校，1877年因剪辮改裝而被撤回中國，畢生以翻譯為職業，譯有《黑蠻風土記》。宋文翹乃澳門富商宋縉之子，是第二批留美幼童，1873年赴美，先後在康州和麻省求學，1878年入讀麻省理工學院，1881年因清廷提前撤回留美幼童而回國，後入福州船政學堂進修，畢業後任職於清軍水師，升至管帶，曾率艦參加甲午戰爭，戰後卻獲罪留用，1899年棄軍從商，1907年因清廷重建海軍而再任炮艦管帶，辛亥革命時率艦隊加入革命陣營，民國初年獲授海軍少將，1913年因病去世後獲追授海軍中將。挖掘和研究澳門留學史的人物，有助梳理澳門留學史的脈絡，還原澳門留學史的樣貌，從而考察澳門在明清以來中國留學史上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 史錦鏞；宋文翹；留美幼童；澳門宋氏家族；澳門留學史

引言

1872至1875年，清廷分4批，每批30人，共組織了120名8至16歲男孩前往美國留學，史稱“留美幼童”，從而開啟了中國近代首次官派留學的進程。在120名留美幼童之中，廣東籍學子佔84名，其中第一批24人、第二批24人、第三批17人、第四批19人。在廣東籍幼童中，計香山縣40人、南海縣15人、番禺縣6人、新寧縣5人、順德縣5人、四會縣3人、新會縣3人，博羅、鎮平、海陽、開平、潮陽、新安、鶴山各1人，可見尤以香山縣為最。揆諸文獻，在這些香山籍留美幼童之中，有兩人來自澳門，分別是第一批的史錦鏞和第二批的宋文翹。

香山縣恭常都南屏村人容闈是留美幼童的倡議者和組織者之一，其家鄉南屏村距離澳門僅三四公里之遙，早年曾在澳門求學有七八年之久。早在1835年，年僅七歲的容闈就被父

親送到澳門求學，入讀郭實獵夫人瑪麗所創辦的學校；1839年該校停辦後，於1840年入讀創校僅一年的澳門馬禮遜學校，直至1842年該校遷到香港島辦學。1847年，容闈與同學黃勝、黃寬追隨校長鮑留雲（Samuel Robbins Brown）赴美留學，並於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至1854年畢業，成為第一位畢業於美國高等學府的中國人。澳門是容闈求學之路的起點，奠定了容闈畢生致力於西學東漸的基礎和底蘊。因此，容闈在其幼童留美計劃得以實現時，返回香山故鄉招募學生。他對早年求學之地、東西方交流的重要中轉站澳門有着特殊的情感，專門挑選了兩名澳門學童赴美留學，引領他們走上留學之路，其對澳門學子應該是有一些期待的。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晚清檔案、報刊和族譜等史料，對兩名澳門留美幼童的事跡及其家族情況作基本的梳理和研究，以期推動留美幼童群體的個案研究，以及澳門留學史的研究。

一、“剪辮改服”史錦鏞

史錦鏞，號瑞臣，英文名為Sydney C.

* 賓睦新，國際關係博士，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研究人員，西安思源學院陝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留學生與中國現代化重點研究基地研究員。



圖1. 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抵達舊金山合影，自左至右為：鍾文耀、梁敦彥、黃仲良、蔡紹基、黃開甲、牛尚周。（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ix_First_Detachment_students_on_arrival_in_California.jpg>。）

Shih，也寫作 Shih Chin Yung¹或 Sze Kin Yung。據其譯著《泰西風土記》的署名“南海史錦鏞瑞臣譯語”推測，²其祖籍應為廣東南海縣（今佛山市南海區）。另，據徐潤《徐愚齋自叙年譜》載：“同治十一年壬申七月初八日第一批官學生名單：……史錦鏞，廣東香山縣澳門，年十五歲，戊午。”³以及唐元湛《遊美留學同人姓名錄》載：“史錦鏞，廣東廣州府香山縣澳門，年十五歲，戊午。”⁴筆者推測，史錦鏞早年入選第一批留美幼童時

填寫的籍貫澳門，應該是其出生地，且出生年份應為咸豐八年，即1858年。史錦鏞家族應該是祖輩或父輩到澳門經商或務工，由此才定居澳門，與容闈有同鄉之緣，因而在容闈於1871年回家鄉招募學生時，有機會入選第一批留美幼童。

（一）留美始末

史錦鏞是1872年赴美留學的第一批留美

澳門研究

幼童。⁵ 據上海《申報》載，史錦鏞等留美幼童於當年七月初九日（8月12日）登船啟程，航至日本橫濱換乘輪船，八月初十日（9月12日）抵達美國舊金山，八月十三日（9月15日）搭乘火車前往紐約，⁶ 其後到達美國馬薩諸塞州春田城（Springfield），再由容閔安排寄宿家庭和入讀學校事宜。

經容閔等人安排，史錦鏞寄宿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Hartford, Connecticut）的史蒂文斯（J. S. R. Stevens）家中，⁷ 而後就讀於馬薩諸塞州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 Massachusetts）。⁸ 該校是大學預備學校，屬於高中性質，並且與容閔頗有淵源，不僅是其恩師、馬禮遜學校校長鮑留雲的母校，也是1847年容閔赴美留學時曾入讀的學校，師徒兩人都在此校學習後考入耶魯大學。由於這層關係，容閔安排了不少留美幼童在此求學，並順利考入耶魯大學。史錦鏞被安排在此求學，大概也是為升讀大學作準備。⁹

1875年10月29日，史錦鏞在孟松學校的一本留言簿留下中文詩句：“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瑞臣史錦鏞。”又用英文寫道：“The Holy Bible. May this be your Guide. Sydney C. Shih, Oct. 29th, 1875.”¹⁰

1876年10月5日，史錦鏞在寫給孟松學校女同學詹妮（Jane）的信中，首先對她過去一周被禁閉在某地做某事表示同情，然後提及自己希望在一年後入讀耶魯謝菲爾德工學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of Yale），近期將去哈特福德與一位公理會的女士談一些宗教的事情，最後談及前幾天收到另一位女同學哈蒂·吉爾伯特（Hattie Gilbert）從奧斯科達（Oscoda）來的信，提及她去費城參觀了美國建國百年博覽會，這個月就要回家。¹¹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容閔對留美幼童有很大的影響，使得史錦鏞等學生也期待入讀耶魯大學；此外，史錦鏞很好地融入了美國社會，與美國同學關係很好，並且熟練地掌握英語寫作，英語水平應該得到了很大提升，這也彰顯出容閔

安排留美幼童寄宿在美國家庭及從中學階段開始留學，在語言學習和融入當地生活方面的優勢。筆者認為，史錦鏞能夠在美國適應良好，與其在澳門出生和成長，自幼與西人接觸、相處的大環境有很大的關係。相較於其他在鄉村出生和成長的幼童，澳門幼童應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以及融入西方社會。

然而，史錦鏞留學的時間並不長。1877年4月，史錦鏞因剪辮子和改穿西裝而被撤回中國。1877年8月30日，李鴻章在寫給沈葆楨的諮文中提及：“今年三月撤回之頭批史錦鏞……”¹² 以及1878年1月19日，李鴻章致函出洋肄業局總辦陳蘭彬：

史錦鏞等四名前已撤回。史錦鏞到金山後，剪辮改裝，情殊可惡。曾篤恭有假冒混騙情事，與多病之陳乾生一併撤回，恐皆為洋行所用。幼童出洋肄業，原期造就人才，收拔十得五之效，乃撤回之輩，文字語言略有所得，若皆如史錦鏞之剪辮改裝，黃錫寶、曾篤恭之依投洋人，以國家有用經費豢養若輩，轉冀撤回回華，另尋出路，前功固已盡棄，後患何可勝言。尊意嗣後因事撤回幼童，應由駐洋委員備文送交上海道查核，抱病者病痊赴各廠局效用，魯鈍者徑撥各廠局充當粗工，庶帑金不致虛擲，生徒亦免效尤，實為維持大局、杜絕取巧起見，擬即由敝處分札飭遵。將來台旌到美後，仍諄屬該委員等照辦為幸。¹³

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作為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與前任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請派遣留美幼童，設置出洋肄業局，委任陳蘭彬為總辦、容閔為幫辦，籌備留學事宜。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國藩去世後，李鴻章成為留美事業的實際領導，對於留美幼童中出現的問題極為關心，於是與陳蘭彬往來函商提前撤回留美幼童的原因及回國安置問題。另據美國學者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研究，史錦鏞被撤回的原因可能是欠款。¹⁴ 由於

該觀點僅根據拉法格（Thomas La Fargue）的一張卡片，沒有資料來源，而且當時清廷給留美幼童的生活費用豐厚，應該夠其使用，故此值得商榷，仍需要更多資料加以證明真偽。

對於史錦鏞等因違規、生病、愚鈍等各種原因提前撤回的幼童，李鴻章等朝廷大員基於洋務人才匱乏，主張留美幼童是官費培養的人才，不能放任他們到洋行任職，應由駐洋委員（出洋肄業局總辦）與上海道（分巡蘇松太常等地兵備道）協調，按照幼童撤回原因分別安排到洋務企業的不同崗位。然而，史錦鏞被提前撤回中國後，並沒有被朝廷委派任何事宜，只得自謀職業。於是，史錦鏞藉其熟練英語之優勢，畢生以翻譯為業。由於上海當時為中外交流之重地，他便選擇在上海就業。

2023年1月3日，筆者曾採訪史錦鏞曾孫女史美珍，請教其家史。據史女士所述，史錦鏞返回中國後，曾一度在上海格致書院任英文教員，並自設翻譯處代譯文件，但是筆者尚未找到相關史料佐證。1880年2至3月間，史錦鏞在上海《申報》連續刊登了一則相面廣告：

江南相士程萬里……今來上海寓新新樓舊址大吉祥棧內，常相三伯，欲知終身事業，盍往問諸。廣東史瑞臣啟。¹⁵

史錦鏞回國之初就與相士交往，大概是此時命運不佳，漂浮不定，因而有此舉動。史錦鏞在上海的住所位於崇德里，曾在畢德衛的洋行任職，後於1881年10月31日離職。據《申報》記載：

本行前請住在上海崇德里之史瑞臣在行辦理事務，現於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月三十一號辭歇生意，現與本行概不相干，以後不能再用本行名目也。畢德衛啟。¹⁶

史錦鏞失業後，曾在上海某報館擔任了一段時間主事兼翻譯。1882年，史錦鏞在《申報》刊登了一則聲明，文中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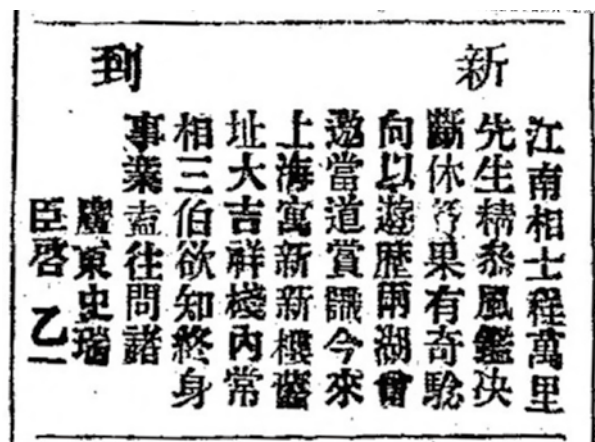


圖2. 史錦鏞於《申報》刊登之相面廣告（圖片來源：廣東史瑞臣：〈新到〉，《申報》，1880年3月8日，頁7。）

余本為他報館主事並繙譯，今因承友另有別就，相邀於本月初三日，即西曆八月十六號接前途來信定奪後，隨即具函婉復洋東，現已定見辭職，西八月十六號以後，所有該報館各事均與余不涉，特此聲明。瑞臣史錦鏞啟。¹⁷

史錦鏞辭去報館職務，可能與他向“奉委來滬向洋商畢德衛購辦軍火”的李光廷借款有莫大關係。李光廷此前曾控訴“被通事史瑞臣借去銀三百兩，洋一百元，請為傳史質訊，如其不認，請將史移解前去審問”。¹⁸史錦鏞後被傳去英租界審問，他承認收取費用，辯稱因為李光廷虧空過多，請其向洋商畢德衛商議，扣用銀615兩，事成後給了史錦鏞300兩謝金。據史錦鏞所言，畢德衛和怡和洋行上海分行總辦唐茂枝（唐廷桂）都知道這事。唐廷桂是廣東香山縣恭常都唐家村人，是輪船招商局總辦和開平礦務局總辦唐廷樞的長兄，也是澳門馬禮遜學校的第一批學生，與容閱是同學關係，其長子唐榮俊是第四批留美幼童。大概因為這幾層關係，所以唐廷桂出面為史錦鏞解決此事。¹⁹至於李光廷所說的史錦鏞曾向他借了100洋元，史錦鏞供稱已經還了50兩及20洋元，並且有收條為證。實際上，這300兩並非李光廷所有，而是李光廷向畢德衛索取的賄賂。據畢德衛稱，李光廷購買軍火的費用是12,300

澳門研究

兩，其被勒銀 615 兩，而後李光廷送給史錦鏞 300 兩作為中介或翻譯酬金，讓畢德衛頗為不滿。唐茂枝也認為李光廷之舉不妥。最後經過上海中英兩國官員會審，判定李光廷給史錦鏞的 300 兩須退還畢德衛，史錦鏞被唐茂枝擔保出來，此事就此宣告解決。²⁰

至於史錦鏞所言“另有別就”，實際上是在致遠街崇德里開設“瑞記繙譯館”，試圖以所習的西學知識來謀生。其業務內容包括“經手代繙華英文字各件，並設書塾，每晚七點至十點鐘教習英國語言文字、算法、地輿、打樣、繪圖等，束脩不拘”。²¹從啟事中的“瑞記”和“吾師史君曾經出洋多年，品學兼優”，可以斷定“瑞記繙譯館”乃史錦鏞（瑞臣）所開設，並且是藉學生名義在《申報》上做廣告。大概是因為招生不足，該館夏間曾暫停授課，直到秋季才登報聲明重開，²²但最終還是因為生意不佳，大概在 1882 年底或者 1883 年初關閉。從這段經歷可以看出，在晚清社會尚未完全開放的時代背景下，史錦鏞回國後的職業生涯曲折，事業頗為艱辛，他在沒有官府背景下依靠西學知識求職和謀生並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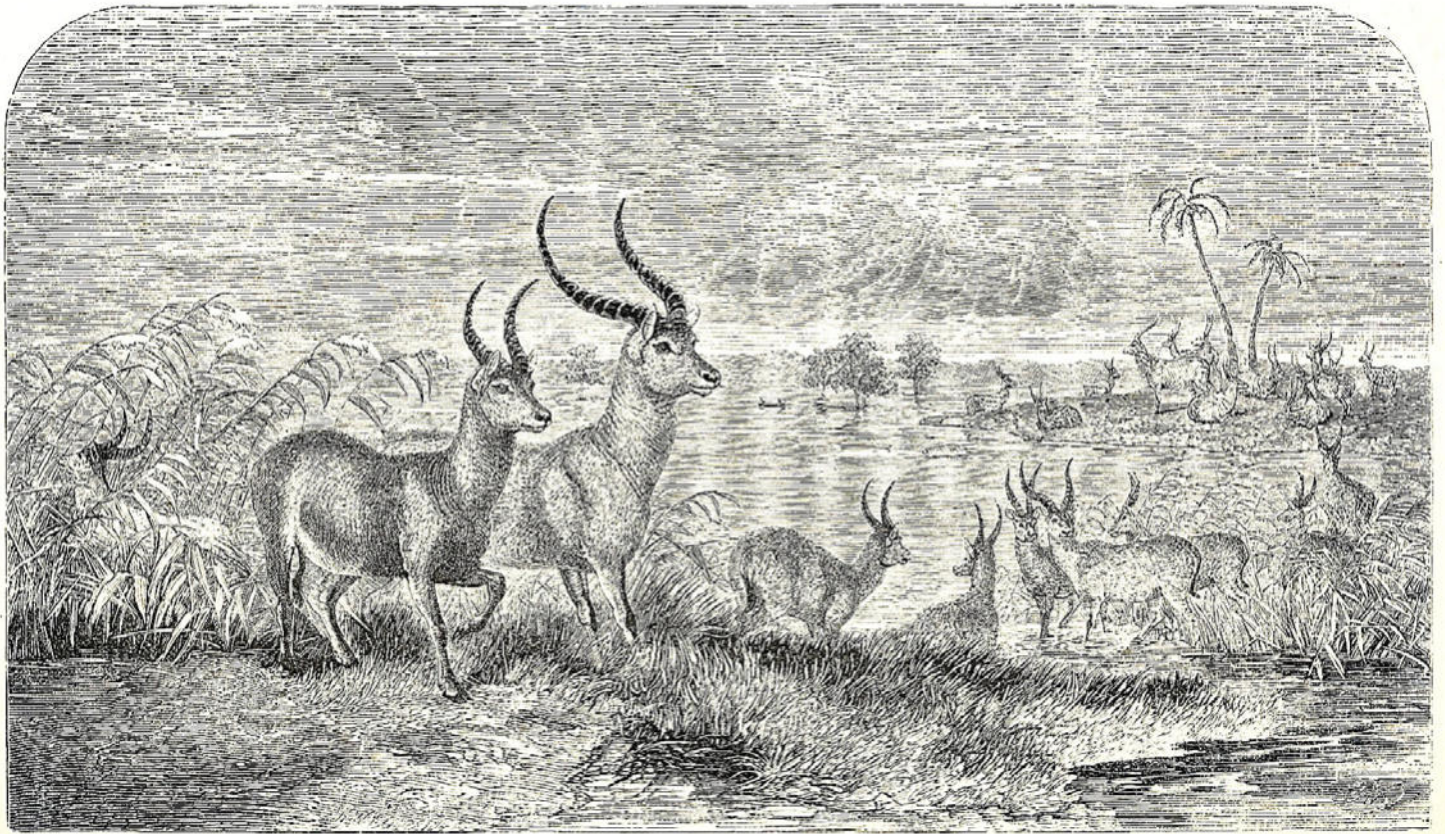
史錦鏞此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以翻譯為生，曾先後在奧匈帝國、美國、俄國等外國駐華領事館任職。1883 年，史錦鏞被奧斯馬加國（即奧匈帝國）駐上海領事夏士（Joseph Haas）聘為“管理華務通事”。²³另據史美珍講述，史錦鏞在 1892 或 1893 年曾擔任俄國駐天津領事館翻譯，1895 或 1896 年在俄國駐上海商務大使處做翻譯。²⁴史美珍作為後人，其口述材料還需要繼續加以考訂。1897 年左右，史錦鏞（《申報》寫作“施瑞成”，大概是據上海英文報刊翻譯成中文的緣故）被俄國駐華使館武官倭高格（Wogack）聘為翻譯。²⁵倭高格又譯作倭高克²⁶、倭馬克²⁷和巫哥庫²⁸，在 1900 年義和團運動期間，曾任八國聯軍的俄軍司令。

1897 年，史錦鏞曾以“俄領事館翻譯施瑞臣”的名義參與了一起案件。史錦鏞妾室汪

氏之女，時年 22 歲，嫁給在上海經商的奉賢人趙桂誠做側室，生有一子。1896 年，趙桂誠因病去世後，由其弟趙全泰每月僅給飯錢 2 元，汪氏之女難以生活，於是偕子返回母親家居住，趙全泰遂找到史錦鏞索要其侄。最後英租界公廨的中國官員判定由趙全泰領回其胞兄之子撫養，汪氏之女自便，“可隨母回去，願守則守，不願須擇良而事，不准姘人”，²⁹對史錦鏞則作“斥退”處理。幾日後，俄國駐上海總領事德密特見到《申報》報導此案後，查看俄國駐華領事館職員，未見史錦鏞之名，遂向上海會審公廨的中國職員屠作倫（號興之）投訴。屠作倫找來史錦鏞審訊，史錦鏞供稱：“曾在俄國欽命駐劄中國總轄東海水陸全軍兵部大堂倭高格處當舌人，前稱在領事署者實係悞供。”³⁰屠作倫轉告德密特，此事才告結束。

1899 年前後，據史錦鏞自述，其“在律師佑尼干處當翻譯”。³¹佑尼干（Thomas Roberts Jernigan）曾任美國駐上海領事（1893 至 1897 年間），卸任後留在上海以律師為業。此後，史錦鏞曾當過天津警察廳翻譯，也曾去過東北瀋陽，在奉天巡撫唐紹儀（1907 至 1909 年間）處做了一段時間翻譯。唐紹儀是香山縣恭常都唐家村人、第三批留美幼童，與史錦鏞有同鄉和同學之情。大概在唐紹儀卸任奉天巡撫後，史錦鏞又回上海，在俄籍律師史特孟（S. E. Strumensky）³²處做翻譯。³³

史錦鏞晚年有過一段很短暫的、失敗的從政經歷。1907 年，浙江巡撫張曾揚和杭州將軍瑞興奏准設局清查升科，清查旗牧各地，引起沙民群起反對並聚眾打毀總局和分局。歷任總辦大多以失敗離職，史錦鏞卻在此時被委任為總管廟分局委員。1908 年 11 月 24 日，沙民聚眾焚毀該分局，並將史錦鏞與司事、局差、親兵等二十多人剝去衣物、驅逐出境。³⁴由於清丈旗地涉及到大量沙民生計和權益，經常引發沙民與官府的衝突，此事一直延續到 1910 年仍未得到解決。或許是因為受此大辱，史錦鏞從此棄政退隱，再未見有報刊報導其消息。



NEW AFRICAN ANTELOPES (POKU AND LECHÉ) DISCOVERED BY OSWELL, MURRAY, AND LIVINGSTONE.

圖 3. 立溫斯敦非洲遊記所載之羚羊圖，後被收入史錦鏞之中譯本，中文題名為“湖上所見羚羊”（頁 3）。（圖片來源：CC0, via Smithsonian Library <library.si.edu/digital-library/book/missionarytravel11857livi >。）

從史錦鏞的職業生涯可以看出，李鴻章等人在官費留學生撤回後的職業安排上，雖然擔心“恐皆為洋行所用”，欲安置於洋務廠局，但實際仍是放任自流，沒有真正實施該計劃。因此，毫無背景、僅憑英語這一技之長的史錦鏞，只能以翻譯為業，養家糊口，此間數次被人控訴，大多因香山同鄉關照而得以解決。

（二）首譯《黑蠻風土記》

由於英語能力較優，史錦鏞於 1879 年和沈定年合作翻譯了英國人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於 1858 年出版的非洲遊記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³⁵ 該譯本題為《黑蠻風土記》，有“英國立溫斯敦著，南海史錦鏞瑞臣譯語，山陰沈定年鮑山述文，武進陳以真璞卿校字，光緒五年刊本”字樣，書名邀請“五茸王秉槐梅生甫題”，³⁶ 序言則由《申報》主筆沈定年撰寫。

沈定年（？-1885），號鮑山，浙江山陰

人，曾在上海求志書院求學（1879 至 1882 年間），³⁷ 兼任上海機器印書局經理人（1877 年），³⁸ 又任《申報》主筆，久居上海，應該與史錦鏞有過交往。沈氏序文寫道：

戊寅夏，尊聞閣主人屬史君瑞臣，譯其語飾取而遙存之。史君以方言館生游學倫敦以歸，盡通西文義例，而自幼出洋，未嘗習中學，因以文屬余。³⁹

其中，戊寅即光緒四年（1878 年）；“游學倫敦”乃是錯誤，因為史錦鏞是到美國留學；“尊聞閣主人”是《申報》創辦人美查（Ernest Major）。可見，史錦鏞翻譯該書是應《申報》之邀。由於此前從未有人將立溫斯敦的著作翻譯成中文，所以史錦鏞此本乃是首本。

《黑蠻風土記》全書分為 61 篇短文，附圖 19 張。可見史錦鏞翻譯該書時尊重原著樣式，圖文並茂。然而，大概是因為留學時間較短，學識所限，抑或其他原因，史錦鏞未能盡譯立溫斯敦的原著，從而引發了一些爭議。有的學

澳門研究

者認為這一譯本價值有限，也有學者肯定了該書的價值。梁啟超在《讀西學書法》中提及：

英人立溫斯敦，居非州內地二十年，諳其地利，習其人情。近年歐人剖分非洲，半用其言也。今彼之著述，譯成華文者，有《黑蠻風土記》一書，敘述瑣屑，無關宏旨，蓋必尚有他書未譯出者也。⁴⁰

1891年，王錫祺將《黑蠻風土記》改名《泰西風土記》，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2帙第9冊，二十世紀初由上海著易堂重印。⁴¹此外，《畫圖新報》在1891年第12卷第3期曾轉載《黑蠻風土記》的首篇〈大獅〉。⁴²《新學書目提要》在對比各國風土著述時，稱：

（《澳洲風土記》）備述形勝，亦及瑣俗，雖遜於立溫斯敦《黑蠻風土記》之詳，亦尚簡明有要。⁴³

廖平則評價道：

可知其時之簡牘，不過如《黑蠻風土記》，樸野譎陋，徒資笑柄。⁴⁴

顏健富對史錦鏞翻譯的《黑蠻風土記》有較為深入的研究，⁴⁵對該書評價較高：

1879年，《申報》尊聞閣主人囑咐的翻譯任務，促成百年來唯一一部立溫斯敦著作的中譯本——《黑蠻風土記》。⁴⁶

整體來看，儘管眾人對史錦鏞譯本褒貶不一，但至少引起了一部分中國人對非洲的關注，增進了一部分中國人對非洲的了解。

（三）史家遺事

關於史錦鏞去世的時間和地點，留美幼童同學和史錦鏞的後人皆語焉不詳，只能估計是在民國建立前後去世。去世地點也有兩說，據留美幼童同學錄記錄是在上海去世，而史錦鏞

後人則憶述其在廣州去世。史錦鏞的孫子史玉泉的回憶也類似：

我出生的時候我祖父已不在人世了，他叫史瑞仁，是早年清朝派去美國留學的一百個青年中的一個。他在一國的時候不大守法，人家都梳辮子的，他出去看見美國人沒有辮子，自己就把辮子剪掉了，犯了這個錯誤，清朝官員覺得他不忠，就把他調回來了。他是廣東人，回國後在廣州工作，後來在廣州去世。⁴⁷

其中，“史瑞仁”是史瑞臣之誤，因粵語中的“仁”和“臣”讀音比較相似。因為史錦鏞回國後長期在上海工作，家人也定居在上海，筆者認為他在上海去世的可能性比較大。

至於史錦鏞的家庭，其祖輩和父輩的生平已經不可考，但其子孫履歷還是能夠通過挖掘近代資料，梳理出一個梗概。史錦鏞之子史元愷，字志南，曾就讀於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史元愷入讀該校，相信跟其父的留美幼童身份有很大關係，可能得到津海關道兼任北洋大學督辦的幾位留美幼童的關照。比如，同為第一批留美幼童的蔡紹基早在1895年北洋大學堂創辦時，即出任二等學堂總辦；⁴⁸1902至190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唐紹儀出任津海關道兼北洋大學堂督辦；⁴⁹1904至1905年，蔡紹基出任津海關道兼任北洋大學堂督辦；1905至1906年，第一批留美幼童梁敦彥出任津海關道兼任北洋大學堂督辦；⁵⁰1907年5月至10月，第三批留美幼童梁如浩接任津海關道兼任北洋大學堂督辦；⁵¹1907年10月至1910年6月，蔡紹基再次接任津海關道兼北洋大學堂督辦。⁵²由此可見，先後有蔡紹基、唐紹儀、梁敦彥和梁如浩這四位留美幼童出任了津海關道兼北洋大學督辦，他們關照自己的同窗之子，亦屬情理之中。

史元愷畢業後的經歷比較複雜，曾在海關任職，⁵³也在交通大學任教。據宣統二年十二月“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教員（籍貫、學

科)一覽表”顯示：“史元愷(廣東香山，算學、物理)。”⁵⁴民國後，史元愷主要在鹽業機構任職，曾任職於鹽務稽核所，擔任上海鹽務稽核所幫辦、⁵⁵華中鹽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鹽業公司)董事等職。⁵⁶其子史玉泉回憶：

我父親在天津北洋大學學習，畢業後就出來教書，那時教師可以兼職的，所以他就在多所學校教書，教書的工作很辛苦，他後來就考取了鹽務稽核所。鹽務稽核所是一個很大的公務部門，全國各地都有分支機構，經常會調動工作。我小時候就隨着父親到過浙、魯、湘、豫等省。一直到我7歲時，才定居於上海，跟着祖母一起生活。⁵⁷

關於史元愷的家庭情況，其子史玉泉回憶：

我們兄弟姊妹一共十個，一個是女的，九個是男的，我是第七個，家裡人就叫我老七。我的姐姐是老四，讀完高中就去社會上工作，後來得病死了。老大是同父異母生的，我父親的第一個太太生了一個兒子後就死了。父親又娶了一個，生了九個兒子，(是)我祖母把我們帶大的。⁵⁸

史錦鏞的孫子史玉泉，於1919年6月出生在浙江餘姚；1938年考入上海醫學院；1944年畢業後在重慶市民醫院行醫，1945年調到上海中山醫院，1952至1953年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主持顱腦火器傷的治療工作，擔任志願軍華東榮軍學校醫療隊隊長；1980年擔任中國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導師，培養碩士研究生10名，博士研究生5名；1989年退休，獲授華山醫院終身教授；2022年3月17日去世，享年103歲。2018年11月16日，史錦鏞曾孫女史敏珠、曾孫史建恩參加了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和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容闈誕辰190周年、幼童留美140周年暨改革開放40周年學術座談會”，並在會上提到：“他的後代有很多人畢業於一流的大學，學法律、

化學、醫學和土木工程學等等，成為各個領域的精英、棟樑之材。”⁵⁹但未有詳細說明是哪些人物。

綜上所述，史錦鏞作為第一批留美幼童赴美求學五年(1872至1877年)，由於曾在澳門生活，接受中西文化的熏陶，所以赴美後能很好地融入美國當地生活，英語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然而，其因思想過於開放，剪去辮子和改穿西裝，破壞了留學規章，從而被取消官費名額，提前撤回中國。回國後，史錦鏞並且沒有被清廷安置就業，畢生只能自謀職業，以翻譯為生，雖然談不上碌碌無為，但是沒能像詹天佑、唐紹儀、梁誠、梁敦彥等遵守留學章程、回國後被安置在政府機構內的留學生般得到朝廷重用，甚或升遷至朝廷(政府)要員。當然，史錦鏞作為留美幼童的一員，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代表，其家族如何從南海遷到澳門，其早年在澳門的生活情況如何，他在晚清的翻譯活動情況如何，在外國駐華領事館或律師行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發揮了怎樣的用？諸如此類的問題，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間。

二、海軍中將宋文翹

宋文翹(1859—1913)，字叔儀，祖籍廣東鶴山，⁶⁰英文名為Sung Mon Wai或Song Wen-hui，也寫作Sung Mun Wai、Song Wan Yu。宋文翹出生於上海，在澳門結婚，娶華人女子陳氏為妻，生有三個女兒，分別出生於1883年、1890年和1892年。⁶¹

宋文翹來自澳門，是澳門富商宋縉之三子。⁶²最早關於其生平的英文記載，見於1880年《麻省理工學院師生名錄》的登記信息：

Sung Mun Wai, Macao, China, 11
Yarmouth St.⁶³

最早的中文記載來自徐潤的《徐愚齋自敘年譜》，它詳細記載了四批留美幼童的信息，其中寫道：

澳門研究



圖 4. 宋文翹中年便裝照，載《麻省理工學院同學錄》，1909年，頁94。（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 <hdl.handle.net/2027/hvd.hn59hx>。）

同治十二年癸酉五月十八日第二批官學生名單：……宋文翹，廣東香山縣，年十三歲，辛酉。技藝，父達泉，閩省船政局習機器。⁶⁴

宋達泉即宋縉，乃清代澳門著名華商，與其弟宋勳、宋紳皆為澳門社會名流，熱衷慈善公益，頗有聲望。後文將對澳門宋氏家族作整體介紹，此處按下不表。

（一）求學生涯

1873年，時年13歲的宋文翹作為第二批留美幼童赴美，由容闈的馬禮遜學校同學黃勝（黃平甫）和新任肄業局教習容增祥（容元圃）偕行，其同學包括：蔡廷幹、吳應科、容揆、蘇銳釗、丁崇吉、陸錫貴、李恩富、黃有章、張祥和、陳乾生、曾溥、容尚勤、唐國安、唐元湛、鄧桂庭、鄺景垣、鄺詠鐘、梁普照、卓

仁志、吳仲賢、溫秉忠、梁金榮、方伯樑、王鳳階、李桂攀、張有恭、陳佩瑚、梁普時、王良登。⁶⁵他們於1873年6月12日從上海啟程，14日到日本長崎，16日到神戶，20日到橫濱，23日再次起程，7月13日抵達美國舊金山，再乘火車前往美國東部。據《申報》載：

滬局二批出洋幼童業於五月十八日啟行，二十至長崎，二十二至神戶，二十六至橫濱，疊次有信悉，沿途粵東同鄉款洽甚殷，禮文備至。即於二十九下午由橫濱啟行，昨接到電報，知六月十九抵美國金山埠，均各平安，計期火車七日，於二十八九可到美國都城總局矣。⁶⁶

宋文翹抵達後，先後入讀康涅狄格州威利曼蒂克（Willimantic, Connecticut）的納喬格學校（Natchaug School），以及馬薩諸塞州阿姆斯特（Amherst, Massachusetts）的薩默維爾高中（Somerville High School）。1880年，美國人口統計調查對宋文翹的登記情況如下：

Song Mun W. 19, Somerville, Mass., at school, boarding with John L. Hammett.⁶⁷

1878年，宋文翹考入了麻省理工學院（Boston School of Technology，別稱波士頓理工）船舶預科學校。在留美幼童之中，考入該校的有宋文翹、鄺詠鐘、鄺賢儔（1889年）、鄺景揚、薛有福（1882年）、方伯樑、鄧士聰、楊兆楠（1882年），還有一位來自香山縣古鶴村的自費留美學生張文湛（1877至1882年）。⁶⁸

1881年，由於幼童過度西化、剪辮和信教問題不斷，加上美國不許中國留學生入讀軍校以及美國排華風氣日盛（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清廷決定提前撤回留美幼童，宋文翹是第二批撤回的。1881年8月22日，由駐美公使館隨員、容闈堂弟容闈（字達爽，號渭泉）

陪同，宋文翹與蔡紹基、張康仁、錢文魁、黃開甲、黃仲良、鄧士聰、吳仰曾、詹天佑、陳鉅鏞、梁敦彥、歐陽庚、陳榮貴、鍾文耀、容尚謙、陸永泉、劉家照、張有恭、鄧桂庭、蔡廷幹、陸錫貴、蘇銳釗、溫秉忠、梁普照、李恩富、鄺詠鐘、王良登、李桂攀、吳應科、梁普時、陳佩瑚、丁崇吉、沈家樹、徐之煊、鄺賢儔、康庚齡、楊兆南、梁如浩、容耀垣、徐振鵬、吳敬榮、黃季良、鄺祖彝、薛有福、朱寶魁、梁丕旭、林聯輝、吳其藻，共48位留美幼童起程回國。⁶⁹

1882年，清廷在撤回的留美幼童中挑選了宋文翹、陳鉅鏞、詹天佑、吳應科、歐陽庚、蘇銳釗、陸永泉、楊兆楠、鄺詠鐘、徐振鵬、容尚謙、黃季良、薛有福、鄧士聰、吳其藻、鄧桂廷，共16人到福州船政學堂深造，編入後學堂第八屆駕駛班。宋文翹於1882年3月7日入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班，學習駕駛、船藝、槍炮等課程；同年12月結業後，到“揚武”艦實習，隨船南下新加坡、小呂宋、檳榔嶼，北上遼東半島等地實習。1883年4月25日，宋文翹完成所有課程，順利畢業。

（二）海軍生涯

宋文翹畢業後，先後在北洋水師和廣東水師任職，1884年7月被授予五品軍功，並調到北洋水師，充兵船二副；1888年12月升補北洋水師右翼中營守備，充任“定遠”艦槍炮大副；1893年5月13日調任廣東水師“廣甲”鐵脅木殼快船操練大副，11月28日升幫帶大副。⁷⁰ 1894年4月10日，廣東海安營守備蘇永祥革職開缺，所遺職位需要找人接補，李瀚章在奏摺中提及“其湯廷相、趙希祖……宋文翹、黃祖蓮、吳敬榮等十四員，或於此缺人地不宜，或於營伍尚欠歷練，均未便遷就請補”，擬調“奏留廣東水師補用水師提標中營儘先都司林國祥，年四十六歲，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接任，“赤溪協中軍都司缺，以廣甲兵輪幫帶大副、廣東外海水師守備升用都司宋文翹詳補”；⁷¹幾日後，兩廣總督李瀚章又上〈廣

東外海水師守備員缺緊要懇准揀員請補摺〉：

除羅存崇……宋文翹十三員，或於此缺人地不宜或營伍尚欠歷練，均未便遷就請補。⁷²

一個月後，李瀚章再次上呈一份〈揀員請補外海水師都司以實營伍摺〉：

現充廣甲兵輪幫帶大副升用都司宋文翹，年三十五歲，廣東廣州府香山縣人，由文童出洋肄業遞保儘先把總，升補北洋海軍右翼中營守備，復於辦理海軍出力案內奏請補守備後，以都司升用，光緒十七年九月初九日奉上諭：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欽此。旋因調粵差遣，奏開北洋底缺由廣東酌量插補，經部覆准駐冊。該員由海軍實缺守備保升用都司，已經開去底缺，自應以都司升用。查該員勤能幹練，熟悉海洋，並無在外省軍營參革濫保情弊，以之補授赤溪協中軍都司，洵堪勝任，雖升用都司係歸揀發班，且籍隸本府，與例稍有未符，惟儘先班內各員不合請補，水師人材難得，向准破格錄用，謹隨摺聲明，合無仰懇天恩俯准，以宋文翹補授赤溪協中軍都司，俾營伍巡防藉資整頓，如蒙俞允，俟部覆到日，給諮送部引見，並另行揀員調補，以符定制，謹會同廣東水師提督臣鄭紹忠繕摺具陳，伏祈皇上聖鑑，敕部核覆施行，謹奏。奉硃批：兵部議奏，欽此。⁷³

由此，宋文翹得以補授赤溪協中軍都司。

宋文翹曾隨艦參加甲午中日戰爭。1894年5月，宋文翹隨“廣甲”艦編入北洋艦隊；7月隨艦協同“濟遠”和“威遠”號護送清軍到朝鮮；9月8日升“廣甲”號代理管帶；9月17日隨艦參加黃海海戰，管帶為第三批留美幼童吳敬榮；9月18日“廣甲”艦被日軍擊沉，宋文翹被漁船救起；9月20日，宋文翹接替被撤職的吳敬榮，充任“廣甲”艦署理管帶，主持善後工作。

澳門研究

黃海海戰後，清廷追究失敗之責，宋文翹遭革職，留營效力。

由於在海軍境遇不佳，頗不得志，宋文翹乾脆棄軍從商，自1899年起任職於貴州的英法水銀公司，管理一家水銀冶煉廠八年。然而，宋文翹的志向並非是做一個商人，他的內心依然嚮往海軍，只是在等待時機。

1907年，清廷重建海軍，委任薩鎮冰為總理南北洋水師兼廣東水師提督。宋文翹離開貴州，回到上海，出任“建安”魚雷快艇管帶；1909年調任“江利”炮艦管帶，當時宋文翹的家庭住址是上海虹口吳淞路1536號Care of L. W. Mow Tai & Co.；⁷⁴ 1910年12月，宋文翹改任“江元”炮艦管帶；1911年4月12日，內閣奉監國攝政王上諭“宋文翹着補授海軍副參領”；⁷⁵ 4月20日，海軍部奏請簡授“江元炮船管帶宋文翹……海軍副參領”，後調任“鏡清”兵船管帶。⁷⁶

武昌起義爆發後，薩鎮冰率海軍奉命赴援武漢，在南京鎮江一帶集中。宋文翹因資歷最老而被委任為駐沿江艦隊隊長。11月5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在革命黨人的策動下，宣佈蘇州獨立，改稱江蘇都督，並派許崇灝帶着招撫海軍的文告面交宋文翹，希望駐南京海軍能夠和平反正。

許崇灝（1882—1959），字晴江，號公武，出身廣州西關許氏家族。許崇灝先後入讀弁目養成所、江南陸師學堂步兵科，歷任清江南陸軍第九鎮步兵第三十六標第一營隊官、第三營管帶；1910年參加同盟會；1911年與駐鎮江城外第十八協第三十五、三十六標的管帶林述慶、劉成、端木璜生等組織鎮江新軍反清武裝起義。1911年11月4日，第三十五標、三十六標全體官兵宣佈起義，林述慶被舉為司令，許崇灝任參謀長。

因宋紳之女嫁給浙江巡撫、廣州西關許應鑠之五子許炳耘，而許崇灝之父是許應鑠六子

許炳暉。也就是說，宋文翹的堂妹嫁給了許崇灝的叔叔。或許正因為許崇灝與宋文翹早已認識，所以革命黨人才會專門安排許崇灝去勸說宋文翹起義。許崇灝乘坐汽艇前往“鏡清”艦會見宋文翹。宋文翹因此前未曾接觸過革命黨，不敢貿然行事，於是在接到文告的第二天，便召集全艦官兵訓話，要求大家盡忠職守，並當眾將招撫文告撕毀。同時，宋文翹以艦隊長的名義召集各艦艇管帶至“鏡清”艦開會，經討論後，決定駛往鎮江易幟。

1911年11月10日黎明，各艦艇到達鎮江，懸起白旗，全部反正。宋文翹和“楚觀”艦管帶吳振南代表全體官兵登岸向鎮軍都督林述慶報到，各艦艇管帶齊集鎮軍都督府，參加海陸軍聯席會議。宋文翹被推舉為鎮江都督府海軍艦隊司令。隨後，宋文翹和吳振南共同主持駐鎮江的海軍各艦，協同革命軍攻打南京。在協攻南京之戰中，宋文翹率隊夜襲，發炮百餘發，全城震懾，迫使張勳率清軍半夜撤退。宋文翹率艦隊起義不僅壯大了革命力量，使清廷大為震動，更重要的是直接打擊了袁世凱，使得袁世凱以武力消滅革命軍的企圖失敗。在日後保衛武昌的戰鬥中，其率領的海軍艦隊在打擊清軍、運送南方各省軍隊援助武昌等方面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這對於辛亥革命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和示範作用，也是宋文翹從軍以來最值得肯定的功績。

民國成立後，宋文翹升遷很快，可惜未及一年就因病去世，可謂英年早逝，海軍折將。1912年2月1日，宋文翹獲臨時政府海軍總長黃鍾瑛委任為“鏡清”艦艦長；3月參與創辦海軍同志所組織的“中華民國海軍協會”；⁷⁷ 12月30日被授予海軍上校軍銜；1913年6月奉命率“鏡清”艦赴上海，參加鎮壓“二次革命”，負責保護江南製造局；8月20日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11月16日，宋文翹因突發疾病病故。其後，時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熊希齡、海軍總長劉冠雄向袁世凱呈請追贈宋文翹為海軍中將，並照章給予恤金和醫藥、殯殮等費，旋獲批准。原文如下：

海軍總長劉冠雄呈大總統：

據海軍總司令李鼎新轉報，鏡清艦長宋文翹積勞病故，懇准照章給予恤金暨醫藥、殯殮等費各等情，請鑑核批示，祇遵文並批。

為呈請事：據海軍總司令李鼎新呈稱：竊本船艦長宋文翹前因寧滬亂事，於保護製造局時，躬冒炮火晝夜抵禦，際此炎夏之時，軍事危迫，以致積勞成病，自八月以後飲食日少，近來復加痰喘，迨至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其勢益劇，醫藥罔效，詎於十一月十六日景爾病故等情前來，查該艦長宋文翹於保護滬局時，實屬不辭勞瘁，此番病故，委係積勞所致，堪憫惜該艦長。前蒙大總統命令升授少將在案，茲因積勞病故，懇請從優議恤以慰幽魂等因，到部查該少將服役海軍三十餘稔，歷充江利、建安、江元、鏡清各艦長，均資得力，勤勞素著，此次保衛滬局尤為出力，晝夜弗懈，遂致積勞成疾，竟爾病故，殊深惋惜，擬請從

優加一級照海軍中將例給恤，先給一次恤金八百元，其遺族年撫金，應俟恤賞章程公布後再行呈請辦理。再查《海軍俸給法》第六章第三十一條內載：“凡海軍軍人因公致病於事實上不能入海軍醫院調治時，應依第八表給予醫藥費。”第三十三條內載：“凡海軍軍人因公致病死亡者，應依靠第九表給予殯殮費各等語。”此項章程雖未公佈，業經諮送國務院核議在案。擬請大總統俯念該故員因公積勞病故，准予暫照該章程辦理，以示體恤。查該故員係上等階級，每日應給醫藥費八元，計算在醫院六日，應給四十八元、殯殮費八百元。所有擬請給恤鏡清艦長宋少將文翹緣由，理合呈請大總統鑑核，是否有當，伏乞批示祇遵，謹呈。

批：據呈已悉，准如所擬辦理，此批。
(大總統印)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日

國務總理熊希齡、海軍總長劉冠雄⁷⁸

表一. 宋文翹在水師（海軍）任職情況表

任職時間	官職名稱	上級機構	備註
1888年	“定遠”艦槍炮大副	北洋水師	
1892年	“廣甲”鐵脅木殼快船操練大副、幫帶大副、管帶	廣東水師	參加甲午海戰
1906年	“建安”魚雷快艇管帶	長江水師	
1909年	“江利”炮艦管帶	長江水師	
1910年12月	“江元”炮艦管帶、簡授海軍副參領	長江水師	
1911年	“鏡清”炮艦管帶	長江水師	
1911年	“鎮東艦隊”司令	革命軍	率艦隊起義
1912年2月1日	“鏡清”炮艦艦長	中華民國海軍	
1912年12月30日	海軍上校	中華民國海軍	
1913年8月20日	晉升海軍少將	中華民國海軍	鎮壓二次革命
1914年1月23日	追贈海軍中將	中華民國海軍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提供

澳門研究

(三) 澳門宋氏家族

宋文翹出身澳門宋氏家族，其祖上來自廣州府鶴山縣蘋崗鄉（今廣東省江門鶴山市雅瑤鎮昆東村）。蘋崗鄉宋氏始遷祖為宋肇雄，⁷⁹澳門宋氏的始遷祖宋遠祥（1680—1728）為鶴山宋氏十六世，以做草鞋為業，大概於康熙時遷居到澳門，雍正六年去世，葬於三巴門外，同治六年（1867）遷葬谷都平嵐。⁸⁰據族譜記載，“達泉自祖父以來，代習儒業，授徒為生，詩書傳家，別無長物”。⁸¹宋文翹的祖父宋步周（1801—1836）36歲就去世，妻子鮑氏31歲守節，撫養三個兒子：常熙、常昭、常楷，⁸²即宋縉、宋勳和宋紳。

宋文翹之父宋縉，字常熙，號達泉，步周長子，生於道光七年四月十三日（1827年5月8日），去世時間不詳；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在天津報捐“洋軍火”給大沽海防，被直隸總督文祥、通商大臣崇厚奏准，奉旨“由候選同知以知府雙月選用，免保舉，加四級”，將本身應得封典賜封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獲二品封典，八月十四日（9月7日）經戶部查核，次日獲准。⁸³宋縉妻黃氏（1829—1874），庶室周氏，共生八子：文翥、文翺、文翹、文翊、文翬、文翽、文翰、文翊。⁸⁴宋縉早年赴天津經商，經唐廷樞擔保，出任沙遜洋行買辦。⁸⁵同治十二年（1873年）唐廷樞接任輪船招商局總辦後，宋縉獲任天津分局總辦。此外，宋縉還廣泛參與港澳地區的社會事務，曾捐贈香港東華醫院；1858年與鄭然浦贈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中外流恩”匾額；⁸⁶同治九年（1870年）與宋紳等71名澳門紳商，加上81家商號作為發起人，倡辦鏡湖醫院；⁸⁷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年10月25日）李鴻章奏請宋縉“選缺後以知府用”；⁸⁸光緒元年（1875年）宋氏三兄弟參與重修蓮峰廟；⁸⁹光緒二年（1876年）宋氏三兄弟與澳門紳商捐資重修媽閣廟，並贈“海不揚波”匾額；光緒十六年（1890年）與下環福德祠眾值事捐贈“闔坊永賴”匾額。⁹⁰宋縉又與香山富商譚裕功聯姻，由七子宋文翰娶譚裕功之三女。⁹¹

宋勳，字常昭，號卓卿，步周次子，生於道光戊子十月廿二日（1828年11月28日），去世時間不詳；娶譚氏，生一子文耀；同治五年（1866年）在江西米捐局由監生加捐中書科中書銜，次年在湖北捐局請賜封奉政大夫；⁹²光緒十三年八月（1887年9月）曾捐賑救災；⁹³次月又捐錢五百給上海協賑公所，用於賑濟山東、直隸、河南災荒。⁹⁴宋勳之子宋文耀，字英燦，號照寰，國學生，生於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856年12月11日），娶劉氏，生一子應光。⁹⁵宋文耀（宋永康堂）於1895年出任鏡湖醫院總理，⁹⁶曾與盧華紹、何仲殷、霍崇禮等紳董在灣仔開設鏡湖醫院分局。⁹⁷

宋紳，字常楷，號子衡，步周三子。生於道光癸巳三月初六日（1833年4月25日）；妻林氏，庶室區氏，子二：文翀、文翊。宋紳之女嫁給了浙江巡撫、廣州西關許應鑠之五子許炳耘，生二子許崇禧、許崇歡和女兒許廣平。同治六年（1867年），宋紳在湖北捐局由監生捐同知銜；同治九年七月（1870年8月），在雲南報效軍火，蒙雲貴總督劉岳昭、雲南巡撫岑毓英匯奏克復楚雄、南安等地方保舉案內；同治九年閏十月十三日奉上諭，以同知職銜賞戴花翎；同治九年閏十月初四日復在雲南捐局加捐雙月歸部選用。⁹⁸宋紳於1874年參與倡辦鏡湖醫院；1875年參與重修蓮峰廟；⁹⁹1877年鶴山蘋崗宋氏重修族譜，宋紳負責澳門的勸捐採訪；¹⁰⁰1883年被澳門各行公推為鏡湖醫院總理。¹⁰¹1892年孫中山到澳門行醫，曾得到宋紳的資助，¹⁰²同年12月，其作為“知見人”擔保孫中山向鏡湖醫院藥局借款“二千大員”，用於開設“中西藥局”；¹⁰³1893年9月26日與盧焯之（盧九）、陳席儒、吳節薇、曹子基等人為來澳門行醫的孫中山在《鏡海叢報》上刊登題為“春滿鏡湖”的廣告：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也。性情和厚，學識精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¹⁰⁴

湖 鏡 滿 春

大國手孫逸仙先生我華人而業西醫者也性情和厚學識精明向從英美名師游洞窺秘奧現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甚著功效但每日除贈醫外尙有診症餘閒在
 先生原不欲酌定醫金過爲計較然而稱情致送義所應然今我同人爲之釐訂規條著明刻候每日由十點鐘起至十二點鐘止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復由一點鐘至三點鐘止在寫字樓候診三點鐘以後出門就診其所訂醫金俱係減贈他如未訂各欸要必審視其人其症不事奢求務祈相與有成俾盡利物濟人之初志而已下列條目于左
 一凡到草堆街中西藥局診症者無論男女送醫金貳毫晨早七點鐘起至九點鐘止
 一凡親自到仁慈堂右鄰寫字樓診症者送醫金壹員
 一凡延往外診者本澳街道送醫金貳員各鄉市鎮遠近隨酌
 一凡難產及吞服毒藥延往救治者按人之貧富酌議
 一凡成年包訂每人歲送醫金五十員全家眷口不逾五人者歲送醫金百員
 一凡遇禮拜日十點鐘至十二點鐘在寫字樓種牛痘每人收銀壹員上門種者每人收銀三員
 一凡補崩口崩耳割眼膜癰瘡癩瘤淋結等症屆時酌議
 一凡奇難怪症延請包醫者見症再酌
 一凡外間延請報明急症隨時速往決無遷延
 一凡延往別處診症每日送醫金三拾員從動身之日起計

鄉愚弟 盧焯之 陳席儒 吳節薇 宗子衡 何穗田 曹子基全啟

圖 5. 宋紳等人於《鏡海叢報》刊發之廣告（圖片來源：〈春滿鏡湖〉，《鏡海叢報》，1893年9月26日，頁4。）

澳門研究



圖 6. 天神巷 37 號宋家大屋今貌（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dif%C3%ADcio_de_Pou_Ka_Un_08-07-2023.jpg>。）

此外，宋紳等華紳還曾邀請廣州名醫鄧貴修來澳坐診。¹⁰⁵ 1893年12月，宋紳與何仲殷、張定邦、葉成琛等鏡湖醫院紳董向李鴻章稟報：“上年順直水災，曾捐賑銀一千二百兩，本年順直續被水患，又捐賑銀一千九百兩，先後匯解天津兌收濟用。”李鴻章後於同年12月31日奏請朝廷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准澳門鏡湖醫院自行建牌坊。¹⁰⁶ 1897年5月22日，康有為之弟、維新派人士康廣仁與吳節薇、賴際熙、劉光廉、潘飛聲、葉成珍、陳桂籍、尤列、葉侶珊等一百多位澳門名流成立澳門不纏足會，¹⁰⁷ 宋紳與長子宋文翀（宋展鵬）、宋文翹（宋次鵬），以及宋勳之子宋文耀（宋照寰）皆是發起人。¹⁰⁸ 1898年1月31日，宋紳與何穗田、曹子基作為歇業多年的其祥絲廠代理人，拍賣絲廠內所存機器、家具、上蓋鋪底，以便攤還欠項，由時寶堂司理人曹善業（即曹子基）、麥洪以價銀3,010元投得。¹⁰⁹ 1898年3月18日，“澳門按察司兼理商局局長帕索·賈華臚（Passo de Carvalho）斷定成利押東主及司事鄧翼臣倒盆，並派皇家新街商人何連旺作為該倒盆店總理人，又派三層樓街宋紳、天神巷何連勝作為該倒盆店查理數目人”。¹¹⁰ 此外，宋紳也曾捐贈香港東華醫院。

宋文翹留學時登記的家庭地址為澳門天神巷。據唐元湛《游美留學同人姓名錄》載：“宋文翹，廣東澳門鬼仔巷，年十三歲，辛酉，機器。父達泉，閩省船政局習機器。”¹¹¹ 澳門鬼仔巷即天神巷，位於水坑尾街及白馬行街之間，1869年命名，街名有接近天神（天使），可得庇佑之意。曹有、王祿¹¹²、宋紳、何老桂、何連旺等澳中富商也曾居住於此。天神巷是來往南灣、水坑尾及板樟堂、營地街、關前街、北灣一帶商業區的必經之路，當時被華人稱作“鬼仔”的歐美人士絡繹不絕，故有“鬼仔巷”之稱。天神巷37號為宋家大屋，是宋紳的住宅。宣統初年，維新派人士在宋家大屋創辦華商學堂，招收學生百餘人。兩年後，因一名學生在練習體操時不慎摔死，學生家長因此紛紛請求退學，學堂遂停辦。¹¹³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許廣平和長兄許崇禧跟隨母親到澳門避難，住在宋家

大屋，直至完成學業。1915年11月，朱執信來澳門，暫住宋家大屋，秘密設立討伐龍濟光的軍事指揮機構，並發展中華革命黨組織。

結語

關於澳門留美幼童史錦鏞和宋文翹，以及其家族的歷史，本文僅作簡單爬梳。史錦鏞和宋文翹在赴美留學前，均在澳門出生並長期生活，接受澳門中西文化的熏陶，因此他們赴美後的適應力比其他在鄉村出生和生活的幼童要強一些，這從史錦鏞赴美不久便與美國女子有密切交往，以及宋文翹留學五年就考入麻省理工學院就能夠看出來。兩人被分別撤回後，史錦鏞多以翻譯為業，服務於中西方文化之交流；宋文翹則任職於新式水師，後升至艦長，成為中國近代海軍先驅人物。整體而言，兩人都依靠西學知識或技能走上職業發展道路，發揮了自己的才能。整體而言，澳門是他們“西學東漸”之路的起點，奠定了他們成為近代留學先驅、翻譯先驅和海軍先驅的基礎。

本文的研究僅僅是“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的基礎研究，澳門在中西方交往和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特別是通過“留學”這一主題凸顯出來，仍需要學界以澳門留學人物和事件為基礎，圍繞着澳門留學史這個主題，開展深入研究。澳門自開埠以來，曾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和中轉站，有不少澳門本土人士前往歐美求學，也有其他地方的人士先到澳門求學，再往歐美深造，使得澳門在中國留學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澳門留學史是一個有着極高研究價值的課題，可惜目前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仍然不足。未來關於澳門留學人物和澳門留學歷史的研究，尚需澳門或內地學者作系統性的研究，以宣傳澳門在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提升澳門的文化形象。

附：本文係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留學檔案的整理與研究”（15ZDB040）之部分成果。

澳門研究

註釋：

- Rhoads, Edward J. M. "The American Host Familie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1.
- 參見“英國立溫斯敦著，南海史錦鏞瑞臣譯語，山陰沈定年飽山述文，武進陳以真璞卿校字”：《黑蠻風土記》，上海：上海時務書局代印，光緒五年（1879年）。
- [清]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香山徐氏校印，1927年，頁34。
- 轉引自李恩富著，唐紹明譯：《我的中國童年》，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67。
- 〈上海西學局學生赴美國〉，《申報》，1872年7月16日，頁2-3。
- 〈出洋官生到金山電信〉，《申報》，1872年9月16日，頁2。
- 高宗魯：〈中國留美幼童與美國接待家庭名單〉，轉引自石霓：《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66。
-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81-83。
-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頁82-83。
-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81。
-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82-83。
- [清]李鴻章：〈北洋大臣李鴻章諮南洋大臣沈葆楨〉（光緒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7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51。
- [清]李鴻章：〈覆出使美日秘大臣太常寺正堂陳〉（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2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91。
- Rhoads, Edward J. M. "The American Host Familie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4.
- 廣東史瑞臣：〈新到〉，《申報》，1880年3月8日，頁7。
- 畢德衛：〈聲明〉，《申報》，1882年2月28日，頁6。
- 瑞臣史錦鏞：〈聲明〉，《申報》，1882年8月20日，頁4。
- 〈追繳扣銀〉，《申報》，1881年8月18日，頁3。
- 賓睦新：〈唐廷桂研究〉，博士論文，澳門科技大學，2023年。
- 〈追繳扣銀〉，《申報》，1881年8月18日，頁3。
- 〈英文書塾並經理繙譯〉，《申報》，1882年3月28日，頁5。
- 〈教授英學〉，《申報》1882年10月26日，頁6。
- 參見〈浙撫轅門抄〉，《申報》，1883年4月30日，頁3；〈浙撫轅門抄〉，《申報》，1883年5月3日，頁3。
- 史美珍口述，賓睦新記錄，2023年1月3日。
- 〈請究妄供〉，《申報》，1897年6月20日，頁3。
- 參見〈借付巖疆〉，《申報》，1898年1月8日，頁1；〈俄計宜防〉，《申報》，1898年3月30日，頁1；〈拳匪猖獗九志〉，《申報》，1900年6月14日，頁1。
- 〈鐵路近聞〉，《申報》，1900年3月17日，頁1。
- 阮湘等編著：《中國年鑑（第一回）》，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頁1993。
- 〈英界晚堂瑣案〉，《申報》，1897年6月11日，頁3。
- 〈請究妄供〉，《申報》，1897年6月20日，頁3。
- 〈英界晚堂瑣案〉，《申報》，1899年4月19日，頁9。
- 神州編譯社編輯部：《世界年鑑》，上海：神州編譯社，1913年，頁445。
- 史美珍口述，賓睦新記錄，2023年1月3日。筆者認為此口述材料尚需進一步考訂。
- 〈升科分局又被搗毀〉，《申報》，1908年12月1日，頁10。
- Livingstone, Davi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Harper & Brothers, 1858.
- 王秉槐，號梅僧，也寫作梅生，江蘇松江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華亭）人。參見王崇人主編：《中國書畫藝術辭典·篆刻卷》，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頁169。
- 參見〈求志書院春季課案〉，《申報》，1879年9月10日，頁3；〈求志書院夏季課案〉，《申報》，1879年12月3日，頁2；〈求志書院己卯秋季課案附錄花紅銀數〉，《申報》，1880年3月31日，頁2；〈己卯冬季求志書院案〉，《申報》，1880年6月11日，頁3；〈求志書院庚辰秋季課案並花紅銀數〉，《申報》，1881年2月15日，頁2；〈求志書院光緒七年秋季課試案〉，《申報》，1882年4月30日，頁2。
- 〈竊寫書籍〉，《申報》，1877年11月20日，頁3。
- 參見[清]沈定年：〈序〉，（英）立溫斯敦著，[清]史錦鏞譯語，[清]沈定年述文：《泰西風土記》，收入[清]王錫祺主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2帙第9冊，上海：著易堂，1891年，頁2。
- 梁啟超：〈讀西學書法〉，江都于寶軒驢莊輯：《皇朝蓄艾

- 文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頁23-35。
41. (英)立溫斯敦著，[清]史錦鏞譯語，[清]沈定年述文：《泰西風土記》，收入[清]王錫祺主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2帙第9冊，上海：著易堂，1891年，頁12-39。
 42. 〈英國立溫斯敦遺稿：大獅(附圖)〉，《畫圖新報》，第12卷第3期(1891)，頁18-19。
 43. 通雅齋同人：〈新學書目提要(卷三)〉，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頁514。
 44. 廖平：《五變記箋述》，劉夢溪主編，廖平、蒙文通撰：《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580。
 45. 顏健富：《穿梭黑暗大陸——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25-73。
 46. 顏健富：《穿梭黑暗大陸——晚清文人對於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66。
 47. 史玉泉：〈我的祖父曾是留美幼童〉，陳雁主編，復旦大學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師道——口述歷史中的復旦名師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2。
 48. 關於蔡紹基在北洋大學堂的任職，《申報》在1898年有兩次記載，包括〈日相過津〉(1898年9月18日，頁1)提及：“繙譯西語者為醫院林麗堂別駕、大學堂蔡述堂直刺。”(林麗堂亦是留美幼童之一)另據〈津門春眺〉(1898年3月22日，頁2)稱：“北洋大臣王夔帥於二月十六日在北洋醫學堂邀請西國官商筵宴，是日學堂內外鋪設富麗，懸掛明燈，入夜燃以紅燭，如萬點繁星，光耀奪目，各國正副領事、工部局董事、兵船主將、學堂教習等均絡繹而來，簞坐者為闔城司道及直隸提督聶軍門，計中外官員共八十餘人，傍晚六點半鐘入座席，夔帥命大學堂蔡述堂直牧朗誦祝詞。”
 49. 《申報》對唐紹儀出任和卸任津海關道的相關記述包括〈本館接奉電音〉(1902年2月23日，頁1)載：“正月十四日，內閣抄奉上諭：湖南按察使著黃建策補授，唐紹儀著補授直隸津海關道，欽此。”又，〈本館接奉電音〉(1904年9月27日，頁1)載：“八月十七日，內閣抄奉上諭：直隸津海關道唐紹儀著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賞給副都統銜，前往西藏查辦事件，欽此。”
 50. 梁敦彥於1904年10月調任津海關道；1905年4月簡放駐美公使，9月又改任外務部右侍郎。詳見《申報》之〈本館接奉電音〉(1904年10月7日，頁1)載：“八月十七日，內閣抄奉上諭：直隸津海關道員缺著梁敦彥調補，着即迅速赴任，欽此。”〈電四北京〉(1907年4月25日，頁3)載：“津海關道梁敦彥已簡放駐美公使政府電促進京商議一切。”〈上諭〉(1907年9月11日，頁2)載：“八月初三日奉上諭：汪大燮現在出差，外務部右侍郎着梁敦彥署理，欽此。”
 51. 梁如浩任津海關道時間較短，僅四個月就調任蘇松太兵備道。《申報》的相關報導包括〈上諭〉(1907年5月12日，頁3)載：“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梁如浩着調補直隸津海關道，奉天奉錦山海關道兼按察使銜着蔡紹基補授，欽此。”〈上諭〉(1907年10月4日，頁2)載：“八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江西按察使著瑞澂補授，欽此。上諭江蘇蘇松太道員缺着梁如浩調補，蔡紹基着調補天津海關道。欽此。”
 52. 蔡紹基在津海關道任上將近三年時間，其於1907年10月接任，1910年6月卸任。詳見《申報》之〈京師近事〉(1910年6月27日，頁6)載：“北洋擬設交涉司，現陳筱帥於十三日有摺奏到京，保舉津海關道蔡述堂觀察為北洋交涉司，並以錢名訓、王克敏二員為陪。”
 53. 《海關職員錄》，上海：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1908年，頁353。
 54. 霍有光、顧利民編著：《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年譜》，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36。
 55. 〈王堯臣死後遺囑訟案續訊〉，《申報》，1935年10月23日，頁11。
 56. 許晚成主編：《上海百業人才小史》，上海：龍文書店編輯部，1945年，頁98；又見寧波幫博物館編：《近代上海甬籍名人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4年，頁110。
 57. 史玉泉：〈我的祖父曾是留美幼童〉，陳雁主編，復旦大學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師道——口述歷史中的復旦名師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2。
 58. 史玉泉：〈我的祖父曾是留美幼童〉，陳雁主編，復旦大學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師道——口述歷史中的復旦名師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2。
 59. 劉志光、李潔、傅啟毅：〈慎終追遠：紀念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闈——容闈誕辰190周年學術座談會紀要〉，《中國科技史雜誌》，第4期(2018)，頁495-498。
 60. [清]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九〈遠祥公房世系〉，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年)，頁13。
 61. 據《麻省理工學院同學錄》(1909年)所載：宋文翹於1859年生於上海。1882年在澳門與一位中國女士結婚，育有三個女

澳門研究

- 兒，分別生於 1883 年、1890 年和 1892 年。他在入讀麻省理工學院前，就讀馬薩諸塞州的薩默維爾高中。其返回中國後，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培訓，畢業後加入揚武訓練船，後來調到北洋水師，1884 年任廣甲艦管帶。1894 年，他在甲午戰爭中率艦在鴨綠江與日本海軍交戰，廣甲艦被擊沉，他則被漁船營救起來，戰後再回到水師。1899 年，宋文翹任職於貴州的英法水銀公司，管理一家水銀冶煉廠八年。1907 年，他離開貴州，回到上海，並被薩鎮冰將軍任命為“江利”炮艇管帶。
62. 據《宋氏族譜》載：“文翹，常熙三子，配陳氏。”見 [清] 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九〈遠祥公房世系〉，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 年），頁 16。
63.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ixteenth Annual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1880-1881*,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 J. Schofield, 1880, p. 14.
64. [清]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香山徐氏校印，1927 年，頁 34。
65. 〈同治十二年二批挑選出洋肄業官生姓名〉，《申報》，1873 年 5 月 27 日，頁 2。
66. 〈二批出洋幼童平安到埠日期〉，《申報》，1873 年 7 月 29 日，頁 2。
67. Rhoads, Edward J. M.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39.
68.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nual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Annual, 1870/71 to 1881/82*. Viewed a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69. [清] 陳蘭彬：〈諮報肄業局各員携回幼童等事〉（光緒七年七月三十日），王杰、賓睦新編：《陳蘭彬集》第 1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頁 272。
70. 劉傳標：《船政人物譜》下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805。
71. 〈粵督牌示〉，《申報》，1894 年 4 月 10 日，頁 9。
72. 〈光緒二十年三月初十日京報全錄〉，《申報》，1894 年 4 月 24 日，頁 13。
73. 〈光緒二十年四月十一日京報全錄〉，《申報》，1894 年 5 月 24 日，頁 13。
74. *Class of 1884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Book*. 1909, p. 13.
75. 〈上諭〉，《申報》，1911 年 4 月 13 日，頁 2。
76. 〈緊要新聞二〉，《申報》，1911 年 4 月 20 日，頁 2。
77. 〈中華民國海軍協會簡章〉，《申報》，1912 年 3 月 25 日，頁 7。
78. 《政府公報·公文》，第 572 號，1913 年 12 月 6 日，頁 12-13。
79. 據《宋氏族譜》載，始遷祖宋肇雄“乃太祖復周公之子，太祖寄籍江西，由賜進士出身，任廣東寶昌縣令，後因此處小亂，太祖命始祖奔逃他方，始祖於是挈眷順流至廣州新會縣暫居松朗村，後嫌其西潦，徙古勞都婆陳村，即滙珍村，又嫌其有水患，遷居蘋崗”。見 [清] 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一〈遷居蘋崗緣由及蘋崗十咏〉，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 年），頁 9。
80. 據《宋氏族譜》載：“遠祥，諱天麟，覃恩誥贈文林郎，恩廣長子，公業草履，始遷澳門，生康熙庚申正月初五日巳時，終雍正戊申七月初六辰時，年四十九歲，原葬澳門三巴門外，同治六年遷葬谷至都平嵐鄉，土名南坑仔之鏡地，丙山外立亥向之原。妣李氏，覃恩誥贈孺人，生康熙辛未正月二十日巳時，終乾隆戊子三月十一日巳時，壽七十八歲，原葬澳門龍田村上，同治戊辰遷葬恭常都上涌村後左便過徑，土名東坑口蛇地，與崑岡公合葬，乙山辛向，墓前立石華表；子三：明岐、明敬、觀友。”見 [清] 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九〈遠祥公房世系〉，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 年），頁 13。
81. [清] 李文田：〈恭祝覃恩誥封夫人宋母太夫人七十壽序〉，載 [清] 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一〈壽文〉，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 年），頁 60-61。
82. 據《宋氏族譜》載：“步周，諱學濂，號佩溪，誥贈通奉大夫，振宇子，生嘉慶辛酉六月十七子時，終道光丙申正月初八子時，年三十六歲，葬澳門龍田村上，同治十一年遷葬恭常都翠微鄉後龍，土名菴山，庚山甲向之原，棺在碑前五尺。配鮑氏，勤儉性成，三十一歲守節，覃恩誥封二品夫人，生嘉慶乙丑七月十九亥時。子三：常熙、常昭、常楷。”見 [清] 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九〈遠祥公房世系〉，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 年），頁 16。
83. 〈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一、二日京報全錄·李鴻章片〉，《申報》，1876 年 2 月 14 日，頁 3；[清] 李鴻章：〈聲明宋縉保獎履歷片〉（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6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頁 459。
84. 據《宋氏族譜》載：“常熙，名縉，號達泉，步周長子，同治元年在天津報捐洋炮軍火，蒙直隸東都文、通商大臣崇奏

- 准，奉旨由候選同知以知府雙月選用，免保舉，加己巳，請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將本身應得封典封贈曾祖父母，生道光丁亥四月十三辰時。妣黃氏，覃恩誥封恭人，生道光己丑三月初八辰時，終同治甲戌四月念一酉時，葬恭常都菴山。庶室周氏。子八：文燾、文翔、文翮、文翎、文翬、文翽、文翰、文翊。”見[清]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九〈遠祥公房世系〉，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年），頁16。
85. 〈追控虧項〉，《申報》，1875年5月28日，頁3。
86. 鍾子程、李俊、張海珊：《細說牌匾》上冊，澳門：培正中學史地學會，2015年，頁184。
87. 〈倡建鏡湖醫院碑記〉，廖澤雲主編：《鏡湖碑林碑匾集》，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頁14。
88. [清]李鴻章：〈輪船招商局運解江浙漕糧出力員紳請獎片〉（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汪熙主編，陳旭麓、顧廷龍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輪船招商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2-23。
89. 〈乙亥年重修蓮峰廟碑記〉，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92-222。
90. 鍾子程、李俊、張海珊：《細說牌匾》上冊，澳門：培正中學史地學會，2015年，頁177。
91. 據《譚敦本堂族譜》載：“十五世祖（例授奉直大夫布政司理問加二級、贈兄嫂後、以同知銜加一級、例授朝議大夫、祖父母四品封典、妣封宜人）裕功公，建北祖次子，諱盾，號綽卿，一字庸菴，生於道光五年乙酉九月初三日子時，終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月十九日酉時，壽八十四歲，遷葬後門山尾。妣容氏，圩仔街邑庠生錫齡公女，生於道光八年戊子二月初一日亥時，終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月二十一日巳時，壽七十五歲，葬與公同墓。庶妣陳氏，福建人，生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二月初三日，終於光緒元年乙亥五月二十八日，年二十九歲，葬後門山尾。生三子：長金璋（容出）、次金畚、三續（陳出）；三女，長適外塘墩馬玉球次子天德（容出），次適古鶴鄭誦之長子冠僑，三適澳門宋達泉之七子（陳出）。據本族敦本堂聯請江西銀會資成過萬，今會滿功成，公有力焉。”參見譚詔等纂修：《譚敦本堂族譜》卷三〈敬聰房積忠第三支〉，民國壬申年（1932年）重修，出版地不詳，頁14。譚裕功曾任禪臣洋行福州分行買辦。
92. 據《宋氏族譜》載：“常昭，名勳，號卓卿，步周次子，同治五年在江西米捐局由監生加捐中書科中書銜，六年常楷弟在湖北捐局請封奉政大夫，生道光戊子十月廿二日子時，配譚氏，誥封孺人，晉封宜人。生道光辛卯十一月十一酉時。子一：文耀。”見[清]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九〈遠祥公房世系〉，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年），頁16-17。
93. 〈上海三馬路與易協賑公所陳竹坪經收山東直隸賑捐七月初六日第三十八次清單〉，《申報》，1887年9月4日。頁12。
94. 〈上海三馬路與昌協賑公所陳竹坪經收山東直隸河南賑捐九月十六日第八百零七次清單〉，《申報》，1887年11月25日，頁9。
95. 據《宋氏族譜》載：“英燦，名文耀，號照寰，國學生，常昭子，生咸豐丙辰十一月十四辰時，配劉氏，子一：應光。”見[清]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九〈遠祥公房世系〉，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年），頁18。
96. 參見《鏡湖醫院徵信錄》，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48。
97. 吳潤生主編：《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頁16-17。
98. 據《宋氏族譜》載：“常楷，名紳，號子衡，步周三子。同治六年，在湖北捐局由監生捐同知銜；九年七月，在雲南報效軍火，蒙雲貴總督劉、雲南巡撫岑奏奏克復楚雄、南安等地方保舉案內；九年閏十月十三，奉上諭，以同知職銜賞戴花翎；九年閏十月初四，復在雲南捐局加捐雙月歸部選用。生道光癸巳三月初六寅時。配林氏，誥封宜人，生道光丙申四月十三辰時。庶區氏，生道光丁未五月念八亥時。子二：文紳、文翊。”見[清]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九〈遠祥公房世系〉，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年），頁17。
99. 〈乙亥年重修蓮峰廟碑記〉，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92-222。
100. 據《宋氏族譜》載：“二十一世紳，字常楷，別字子衡，保奏同知職銜，賞戴花翎，澳門。”見[清]宋章郁等纂修：《宋氏族譜》卷一〈修譜芳名〉，廣州：羊城學院前街合成齋承刊印，光緒三年（1877年），頁1。
101. 參見《鏡湖醫院徵信錄》上冊，頁13；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862。1883年12位鏡湖醫院總理分別為：羅兆池（澄波）、陳熏德（詠南）、阮德華（建堂）、宋紳（子衡）、陳伯（心泉）、李桂良（銘溪）、黎代康（杰臣）、鍾玉燕（懷石）、鄭載堯、陳日升（麗初）、

澳門研究

- 校富祥（麗堂）、袁樹堂。
102. 〈鏡湖耀彩〉，《鏡海叢報》，1893年7月18日，頁5；廣州嶺南大學孫中山博士紀念醫院籌備委員會：《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史略》，廣州：嶺南大學，1935年，頁17-18。
 103. 王文達、劉羨冰、伍華佳：《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83-184。
 104. 〈春滿鏡湖〉，《鏡海叢報》，1893年9月26日，頁4。
 105. 〈名醫到澳〉，《鏡湖叢報》，1894年11月14日，頁6。
 106. [清]李鴻章：〈澳門紳董捐賑建坊片〉（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5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247；〈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京報全錄〉，《申報》，1894年2月29日，頁11。
 107. 〈澳門不纏足會別籍章程〉，《知新報》，第19期，1897年5月22日，頁3-4；〈續登不纏足會別籍倡始人名氏〉，《知新報·告白》，第20期，1897年5月31日，頁1；〈續登澳門不纏足會倡始人名氏〉，《知新報·告白》，第22期，1897年6月20日，頁1。
 108. 〈續登澳門不纏足會倡始人名氏〉，《知新報》，第30期，1897年9月7日，頁26。
 109. 《澳門政府憲報》，第3號，1898年1月15日；第10號，1898年3月5日。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69。
 110. 《澳門政府憲報》，第13號，1898年3月26日。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70。
 111. 轉引自李恩富著，唐紹明譯：《我的中國童年》，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70。
 112. 胡根：〈王祿、王棟家族〉，《澳門早期博彩業》，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11年，頁55-56。
 113.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年，頁318。





B. W. A. Rogers